



肖洛霍夫的思想 与艺术

李树森 著

肖洛霍夫的思想与艺术

李树森 著

吉林大学出版社

DJ76/25

肖洛霍夫的思想与艺术
李树森 著

*

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长岭县印刷厂印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

787×1092 32开 8印张 178 000字
1987年12月第1版 1987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 200册

ISBN 7-5601-0068-6 / I·7
统一书号：10323·19 定价：1.35元

目 录

卷首语 (1)

创作的序幕

——谈《顿河故事》的得与失 (4)

“最心爱的孩子”

——论葛利高里·麦列霍夫的形象 (19)

革命的沉思者

——评彭楚克的形象 (50)

作家灵魂的窗口

——《被开垦的处女地》的结尾简析 (66)

二

肖洛霍夫与屠格涅夫 (78)

“工厂要比教堂更人道”

——评作家创作的基本思想倾向 (92)

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列夫·托尔斯泰

——苏维埃时期农民思想情绪的表达者 (114)

卓越的艺术大师 (148)

三

实事求是是文学评论的生命

- 苏联肖洛霍夫研究简评……………(179)
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
——评西方论肖洛霍夫……………(195)
乔基姆·贝尔与尤里·卢金
——美苏肖洛霍夫研究比较……………(222)
国内肖洛霍夫研究中的几个问题……………(235)

卷首语

米哈伊尔·肖洛霍夫（1905—1984）是继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之后，在苏联文学史上占居第三位的大作家，是当代苏联文学中一位最有声望的文学巨匠，在世界各国人民的心目中，肖洛霍夫也是一位非同凡响、引人注目的艺术大师，他是文学史上一个独特而重要的现象。

乍看起来，似乎使人难以理解的是，这位共产党员的大作家，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学批评界和广大读者中，却引起了长时期的、有时甚至是激烈的争论，直到今天这种争论实际上也还存在，人们对他的创作的认识也还远远没有统一。今天，在苏联、在我国以及许多其他的国家里，占统治地位的传统观点，在我看来恰恰还都是值得商榷的。

在任何一个重大的实际问题的背后，都有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只有把这个理论问题弄清楚了，那么与它相对应的那个实际问题才能得到说明或解决。理论工作者的任务不是拿旧的理论去套新的问题，削足适履，硬要新的现实去服从旧的理论，恰恰相反，他应该在现实中敏锐地去发现新的问题，承认这个问题，并进而用新的理论来阐明这一新的问题，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途径。

在文学史上，一位具有自己独特风格，有着广泛影响的大作家的出现都不是偶然的，总是有其深广的时代原因和社会原因。人们对这位作家的不理解，认识上的不统一，甚至发生重大错误，往往是由人们对产生这位作家的那个时代

还缺乏正确的认识。对于一个时代如果不理解，在认识上有错误，那么对于作为它的一面镜子的作家，自然也就无法正确认识，勉强拿出一个看法来，也难免不发生错误。过去关于肖洛霍夫的争论和认识上的错误就是这样产生的。

肖洛霍夫诞生于1905年5月24日，于1984年2月21日逝世，经历了79个春秋。但是作为一位作家，不论就其作品发表的时代和它们所反映的思想内容来看，他都是属于从十月革命到五十年代这一历史时期的。肖洛霍夫所属的时代和斯大林领导的时期基本上是一致的。在苏联的历史上这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最初阶段，在人类的历史上，它也将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最初试验时期而载入史册。作为一位大作家，肖洛霍夫反映了这一历史阶段的某些本质。

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一封信里曾经说道：“在人类历史上存在着和古生物学中一样的情形。由于某种判断的盲目，甚至最杰出的人物也会根本看不到眼前的事物。后来，到了一定的时候，人们就惊奇地发现，从前没有看到的东西现在到处都露出了自己的痕迹。”^①

对苏联这段历史来说也是这样。到斯大林逝世以前，人们对这段历史的认识还很不客观、很不全面，甚至有严重的错误。因为，一则从十月革命后开始，人们对形势的判断就有了某种由成见引起的盲目性，二则后来苏联社会中的许多错误和弊端又人为地给掩盖了。斯大林逝世以后，许多问题被揭露出来，这时人们才惊愕地发现，一切并不象他们原来所想象的那样简单，一些问题开始暴露出来，他们“从前没有看到的东西现在到处都露出了自己的痕迹”，于是他们怀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68页。

着惊异和痛苦的复杂心情重新去认识过去，客观地去总结历史。经过了二三十年的时间，人们对这段历史的认识越来越清楚了，逐渐地趋于正确。近些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经验，也有助于人们对这段历史的正确理解。

从前，由于对肖洛霍夫所反映的时代还缺乏科学的认识，以至人们对他的创作未能作出清楚的有说服力的解释，甚至在认识上出现明显的错误，是可以理解的，甚至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现在条件已经成熟，已经到了揭开这个秘密的时候。这本书写作的目的就是想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鲜经验的基础上，站在20世纪80年代的高度，去重新认识过去的历史，从而对作为那个时代的一面镜子的肖洛霍夫的创作，给以新的解释，对他的创作作出科学的说明和正确的评价。

本人学疏才浅，深感个人的水平和这一艰巨任务极不相称，所提的看法不仅可能有错误，甚至还可能是非常荒谬的。但是既然深感传统观点很不理想，那么任何探索都应该是允许的。不管这种探索和追求，看起来是多么幼稚，多么可笑，但是如果考虑到目前学术界对这位作家研究的实际状况，那么也许并非毫无益处。

本书共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4篇，分析的是某一问题、某一形象或某一部作品；第二部分4篇，概括地论述了作家创作的基本思想倾向和他的艺术特点；第三部分4篇，简要地、粗略地介绍与评论了几个主要国家对肖洛霍夫的研究。

现在，笔者已将自己的一些很肤浅、很不成熟的想法，做为一得之见，和盘地呈现在广大读者面前，抛砖引玉，希望与大家共同来探讨，深望国内的有关专家、同行和广大读者不吝赐教，多多指正。

創 作 的 序 幕

— 谈《顿河故事》的得与失

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肖洛霍夫，这位卓越的苏联作家，于1905年5月24日，生于顿河军屯州（现在的卡敏斯克省）维约申斯克镇克鲁日伊林村。他的父亲是一个当时所谓的“外乡人”，不得不忍受着一切“外乡人”的共同苦难。他做过商店店员、磨坊经理等工作，当时家庭生活并不富裕，不得不经常变换职业。

1918年国内战争爆发，当时刚刚读完小学四年级的肖洛霍夫就不得不辍学回家，永远地结束了他的学生生活。

1920年，年仅15岁的肖洛霍夫成了内战时期顿河地区尖锐阶级斗争的积极的参加者。后来，他在自传里幽默地写道：“从1920年起，我在顿河一带服务和奔走。当了好一阵征粮工作队员。我们追逐匪帮——他们控制顿河流域直到1922年，匪帮追逐我们，这都是很自然的。有时也落到各种各样的困境里。”^①

1922年，17岁的肖洛霍夫怀着学习的愿望只身来到莫斯科。他想进征粮队员速成中学学习，但是他的理想没能实现。他在这里不得不一面劳动，一面学习。这时他产生了学习写作的愿望，加入了莫斯科共青团作家和诗人的文学小

①《顿河故事》，上海文艺出版社，1969年版，第329—330页。

组——“青年近卫军”，参加了这个团体组织的散文学习班。1923年9月19日，他的第一篇作品——小品文《考验》在共青团的《少年真理报》上发表，同年的10月30日，他的第二篇作品——小品文《三个纽扣》，也在同一杂志上发表。

不久肖洛霍夫决定重返顿河故乡，决心回到他所熟悉、他所热爱的顿河哥萨克们的生活中去，从此就定居在那里。此后，除了偶尔的短期旅行外，他一生都生活在这里。顿河哥萨克的生活，成了他一生创作的“故乡”，成了他一生创作的“唯一源泉”。

在1923—1926年这两三年的时间，他发表了20多篇短篇小说。1926年新莫斯科出版社将这些作品编成两个集子：《顿河故事》与《浅蓝的原野》先后出版。这两个集子里的绝大多数作品都已译成中文，收在1959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草婴译的《顿河故事》里。

1926年初，肖洛霍夫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顿河故事》刚一出版，就引起了评论界很大的兴趣。老作家绥拉菲摩维奇对这部书很赞赏，并为它作了序。他写道：

“肖洛霍夫的短篇小说好象草原上的鲜花，富有生命力。素朴、鲜明，使人感觉到讲的故事好象就在眼前。形象化的语言，那种哥萨克人说的多采的语言。凝练，而这种凝练却充满了生活气息、紧张和真实。在紧要关头掌握分寸，使作品显得真实有力。对于所讲述的事。具有丰富的知识。尖锐的、洞察一切的眼力。有能力在许多征象中挑出最典型的来。所有这些才能说明肖洛霍夫将会成为一个可贵的作家。”^①

①见《顿河故事》，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版，第332页。

绥拉菲摩维奇对这些小说的艺术成就给了很高的评价，并且预言了这些特点对这位作家后来创作的意义。美国一位苏联文学的研究家马克·斯洛宁也曾经指出，后来使肖洛霍夫成为现实主义艺术大师的一切因素：紧张的戏剧性情节，生意盎然的风景描写，富于吸引力的幽默，以及挑逗性的、毫无顾忌的民间俗语等等，都已经包涵在他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中。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可以把这个阶段——作家创作的最初阶段，视为作家整个创作的一个序幕。

肖洛霍夫后来整个创作的思想倾向，他在思想方面的力量与局限，象上面我们谈到那些艺术特点一样，在这些作品里也都已经初露端倪，或明或暗地有了表现。从这方面来看，它也是作家后来整个创作的一个序幕。

肖洛霍夫创作的最初阶段，既然是他整个创作的序幕，那么细心地分析一下这个阶段他写下的这些短篇，对于我们理解作家后来那些长篇巨著，对于我们理解他后来整个的创作，恐怕并不是多余的。

现在我们就来具体地分析一下《顿河故事》。（下面我们将谈到《顿河故事》时，都是指《顿河故事》的中译本，即包括《浅蓝的原野》在内的作家整个早期创作。）

《顿河故事》是作家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和观察而写的，写的是内战年代顿河地区的阶级斗争，是表现哥萨克家庭内部的尖锐的阶级斗争的。这里我们看到，兄弟不同路，父子成了仇人，不是父亲砍死了儿子，就是儿子砍死了父亲。正象作家在一篇作品中所说的，“仿佛有谁在村子里犁了一道鸿沟，把人分成敌对的两方”，仿佛所有的人都被分成了敌对的两方，中间立场的人是没有的，阶级矛盾尖锐到了极点，仿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能这样解决，而不可能有

其他的选择。

譬如，《看瓜田的人》就是写父子之间的尖锐冲突的。父亲很反动，当了法庭的警卫队长。可是两个儿子却同情红军，大儿子菲多尔在家里待不了，决定去找红军，弟弟米嘉也积极支持哥哥。后来他也从家里逃了出去，当了“看瓜田的人”。

菲多尔被俘了。他从白军的枪口下逃出来，藏在弟弟看瓜的棚子里。可是这时父亲来搜查，并且威胁说要把他们两个一起消灭，这时米嘉拿起斧头把父亲砍死，哥俩游过顿河，找红军去了。

《粮食委员》的主题和《看瓜田的人》的主题很相似。儿子不满意父亲殴打长工，从家里被赶了出去。过了6年，他又回到自己的村子。这时他已经是区粮食委员。他的父亲是个富农，不仅拒绝交粮，而且在搜查的时候，还进行反抗，打死了红军，因此被革命法庭判了死刑。阔别了多年的父子，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见面的，谁也不认谁做父亲或儿子了。老头子被枪毙了。过了几天，儿子在哥萨克的反革命暴动中也牺牲了，这里写的的确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在《顿河故事》里，我们有时看到，就连夫妻都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敌，只能有你没我，你死我活。《希巴洛克的种》写的是这样一个故事：一支红军队伍在追击匪徒的半路上，收留一名自称是被匪徒强奸后抛弃的女人。后来，她和希巴洛克同居了，并且怀了孕。其实这是敌人特意打进来的好细。当她难产，生命难保，看来即将离开人世的时候，她自己道出了事实的真象，她说有一次队伍几乎彻底覆灭，就是她给敌人送的情报。根据上级的命令，希巴洛克把她枪毙了，只留下了刚刚生下来的婴儿——希巴洛克的种。

在《顿河故事》中，象《看瓜田的人》《粮食委员》、《希巴洛克的种》这样的作品，绝不是个别现象，而是很有代表性的。在这些作品里，正象有的评论家所指出的：人物“红的”确实是红的，“白的”确实是白的。这里阶级斗争的尖锐化达到了极点，评价人们一切行为的准则只有一条：拥护苏维埃政权还是反对苏维埃政权，其他的一切都是无关紧要的。在这里支配着人们的完全是阶级的情感，它烧毁了一切不相干的私情，“这里被考虑的一切人，都不过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负担者”^①。

《顿河故事》真实地反映了内战年代顿河地区那种紧张的、炽热的阶级斗争气氛，真实地反映了在那不平凡的年代贫苦的哥萨克那种为了苏维埃政权而拚死搏斗的革命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讲，《顿河故事》是一部成功的、不可多得的佳作，它在反映内战年代的文学中占着一定的地位，而绝不是次要的，可有可无的作品。

对人只从“红的”还是“白的”，拥护苏维埃政权还是反对苏维埃政权这个角度来划分，在那个阶级斗争自然化的年代，当然是抓住了根本，把一个人最主要的精神面貌鲜明的突出出来了，但是同时这也给作品带来了一定的局限，就是说它不能多方面来表现人的性格，不能很好地来表现人的复杂性。在这方面，《顿河故事》和作家后来成熟时期的作品相比，显然有很大的差距。

肖洛霍夫一登上文坛就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是在创作的最初阶段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不健康的因素，这就是所谓的客观主义的态度和自然主义的方法。这两者是密不可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页。

分的，因为自然主义就是主张对生活作“纯客观”的描写。

肖洛霍夫早期创作中的客观主义态度，在《浅蓝的原野》里表现得很明显。

扎哈尔老爹给地主陶米林老爷赶了一辈子车，吃了一辈子的鞭子。革命那年，由他的两个孙子：谢妙及安尼凯提议，人们把地主陶米林家的土地和财产给分了。

过了一个礼拜，地主家的继承人，他那个当了白军军官的儿子，带着哥萨克回到村子里来报仇。谢妙、安尼凯都被抓了去。

扎哈尔老爹这时就给少爷去下跪，求他开恩，给两个孙子留条活命。但没有成功。这时他不仅没有愤怒，等枪毙他们的时候，他反而低声下气地向少爷去乞求，说：

“老爷，请您答应他们把衣服脱下吧。他们身上的衣服还好，我们穷，用得着，可以穿穿呢。”

这是什么话！在这种时候难道人们还能想到衣服吗！命都没了，衣服何用！这里作者着力表现的不是一个人的觉醒和反抗，而是他的忍辱精神和灵魂中的卑贱。

关于安尼凯被枪毙被折磨时的描写，作者也是采取了客观主义的态度：

“……安尼凯中了几枪以后，……仰面倒在地上，老爷走过去，很和气地问：你要活命吗？假如你要，那就请求饶恕。我就先给你来上五十记，再送上前线去。安尼凯积了一嘴巴的唾沫，可是没有力气吐出来，都顺着胡子流下来……”

读到这里谁能不感到窝囊，谁能不感到憋气！作者写这些的目的是什么？是想展示一个人的悲剧还是他的卑贱！作者想告诉人们什么？作者对这些不幸者的态度是什么？这不

是津津有味地在欣赏一个人能忍受一切蹂躏和耻辱的耐性吗！

《顿河故事》里还有一篇作品，读起来更是叫人憋得透不过气来，这就是《有家庭的人》。这篇小说的内容是这样的：

米基沙拉是个有家庭的人，妻子死了，给他留下了九个孩子，老大伊凡，老二达尼拉，是男孩，其余那七个都是女孩。两个儿子去当红军，米基沙拉自己因为有七张口得喂养，没有去，却被迫参加了白军。达尼拉和伊凡先后落在反动的哥萨克手里，而他们却让米基沙拉自己亲手杀死他们。

首先被俘的是老二达尼拉，这是他最喜欢的那个孩子，但是他想：“要是我不打他，村子里的人就会把我打死，我那几个小的孩子就会变成没爹没娘的孤儿了”，于是他“紧紧地握住刺刀，用插在步枪上的那一头给了他一下。正好打在这个地方，比耳朵高一点……他喔唷叫了一声，两手捧住脸，从台阶上倒了下来……”天底下那有肯亲手杀害自己亲生骨肉的人呢！看到这番情景，“哥萨克们哈哈大笑”。

不久，大儿子伊凡也落到哥萨克手里。哥萨克们把他交给了米基沙拉，让他把儿子押送到团部去；他们又在无情地捉弄他。但是米基沙拉基于同样的考虑，好象是鬼迷了心窍一样，不管儿子怎样苦苦哀求，也不管他自己心里如何痛苦，在押送的途中，到底还是把儿子打死了。最后他眼里含着泪对儿子说：“伊凡，你代我带上苦难的荆冠吧。你有老婆和一个孩子，可是我家里面有七个呢。要是我把你放掉，哥萨克们就会把我打死，孩子们只好上街要饭去了”。

作者为什么这样写米基沙拉，作者对这个人物的态度如何；对他究竟是揭露还是同情？这一切我们在作品里看不太清楚，不过我们看到，他在忠实地、客观地、不厌其烦地在

描述这颗卑贱的灵魂的种种表现！作者这样做正确吗？目的何在？效果如何？

刘再复同志在一篇论述人物性格的文章中，在批驳一种错误创作倾向时，有一段话讲的很好，他说：“借描写病态的二重人格，剥夺了人心理上和道德上最起码的规定性，把人降低为一堆不成形的生物，这样，文学就完全丧失它的精神价值和感情价值，也丧失作者医治病态社会现象的神圣使命，而与被描绘的病态对象一起陷入病态，陷入理智和道德的崩溃。……”^①

我们完全可以用这段话来理解米基沙拉这个人物，他不是已经被“降低为一堆不成形的生物”了吗！任何残酷的欺凌和蹂躏，他都能忍气吞声地承受下来，这那里还有一点点人的意志和尊严，这不是一具行尸走肉，不是“一堆不成形的生物”又是什么！

我们觉得也可以用这段话来说明肖洛霍夫在塑造米基沙拉这个人物形象时所持的立场，因此我们 also 可以说，他这篇作品也完全丧失了它的精神价值和感情价值，也丧失了作者医治病态社会现象的神圣使命。

刘再复同志在同一篇文章里还写道：“正如契诃夫在致苏沃陵的信中所说的：‘如果作者写一个精神病人，不等于他自己也有病。’这个作家必须对笔下的人物性格、人物心理进行理性的整理和感情的补充，而不能自己首先陷入心理自然主义，然后让笔下的人物也陷入心理自然主义。”^② 我们看到，肖洛霍夫在这里显然是没能做到这一点，我们看不出

①《文学评论》，1984年第3期，第40页。

②同上，第40页。

来他的观点和米基沙拉的表现究竟有啥区别。

刘白羽同志最近在他《谈艺日记四则》一文中，写道：“如果一个作家只一味把丑恶的东西展览给读者，顶多说明他是一个猥琐的极端个人主义者，是一个散布市侩气氛的渺小的人物。”肖洛霍夫这篇《有家庭的人》不就是“一味把丑恶的东西展览给读者”吗！这段话简直就是对肖洛霍夫这篇作品的评论。刘白羽同志在同一篇文章里还写道：“大凡一个伟大的作家，就是涉及到卑贱的描写，他也不是为了引人卑贱。”^①因为肖洛霍夫在这篇作品里，“只一味把丑恶的东西展览给读者”，只顾客观地描写了，正象列宁所说的：“客观主义者证明现有一系列事实的必然性时，总是不自觉地站到为这些事实做辩护的立场上”^②，所以他就难以做到描写卑贱而不引人卑贱了。

有一篇题为《还应当讲一点“卡塔西斯”》的文章，其中有一段讲的很好：“无论以美还是丑为对象，都必须有一种高尚的，正义的、美好的旋律在艺术家的心灵中回响。这时，即使以丑为对象，当丑被支配、被揭示、被嘲讽、被戏弄，‘当众出丑’时，艺术作品也将是美好的、高尚的，同样会收到净化的功效。克罗齐曾说：‘丑首先应被征服，然后才能收容于艺术。’可见这一点甚至连资产阶级美学家都已认识到了。反过来，如果艺术家不具备美好的情感和高尚的情操，或在艺术实践中没有运用这些支配丑，而只是被动地再现和描摹生活中的丑恶，甚至津津乐道、淋漓尽致地展示一些丑闻秽事，……这样的作品所创造的将不是艺术美而是

^①1987年2月19日，光明日报。

^②《列宁全集》第2卷，1955年版，第378—379页。